

# 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透析和近期回潮

王 震

【摘 要】在历史上欧洲的反犹太主要是由宗教、经济、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历史的惯性作用所致,并呈现出反复性、周期性、广泛性、残酷性等特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从去年开始,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又出现了回潮的趋势,这股反犹太主义的回潮,除了一些传统的诱因外,反以情绪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反犹太与反以相结合成为这次反犹太主义的主要特点。这次回潮不管是对欧以关系、欧美关系,还是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欧洲 反犹太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伴随着亚述王国、新巴比伦帝国、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和入侵,犹太人就开始向世界各地流散的历程。他们流入欧洲的人数最多,在这里遭受反犹太主义的迫害也最为深重。时至今日,这股反犹太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并不断的出现新的反弹。本文就试从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欧洲反犹太主义的特点及其近期回潮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简要地分析。

## 一、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根源

“反犹太主义”在英文中多用“anti-Semitism”来表示,其动词形式为“anti-Semite”,它是由前缀“anti”和词根“Semite(闪米特族)”组合变化而来,从字面意思上看,应是“反闪主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都习惯于用这一词汇来指代反

犹太主义。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是在19世纪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因在《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尽管这一词汇出现于19世纪,但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时期就已出现。我们一般认为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把整个犹太人作为迫害和排挤对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反犹太主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历史上,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最为严重,对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欧洲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反犹太的恶浪是由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特点所决定的。

1. 历史的惯性作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推行希腊化政策,镇压犹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一方面帝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犹太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的反犹太排犹太思潮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推行的反犹太措施被后罗马时代

各国所继承。日耳曼部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最初工没有积极的学习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而是去继承和发展基督教，包括对被称为“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

2. 宗教文化上的不兼容性。公元4世纪后，基督教就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犹太教的质疑，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新约》和基督耶稣一直为犹太教所否认，这种否认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几千年来，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所包含的内容，犹太人对这些东西的忠诚就成为反犹主义的一个借口。它们使犹太人被视为局外人，更为重要的是被视为是对非犹太人神祇合法性的一种挑战”。<sup>[1]</sup>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传说中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把犹太人附会成出卖耶稣的犹太人的后裔，这些宗教传说无论其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宗教复仇情绪。最后是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对立。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所以，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要么被归化，要么成为“万恶不赦”的异教徒<sup>[2]</sup>。

3. 经济上的偏见和短视。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嫉妒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实际上“这

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sup>[3]</sup>”

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了出去。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sup>[4]</sup>”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4. 政治地位的缺乏。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凸显了他们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的成为权力争斗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地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

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作为“替罪羊”。

犹太人由于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有别于基督教世界。这种差异使他们往往被视为是“非我族类”,进而形成一种深刻的偏见。按理上说这种差异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冲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内部都存在两种机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它是一种文化出于保护自身的本能而对外来异质文化做出的反应。包容性则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并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两种机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与这种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开放程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世界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那种优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占据社会思想主体地位后所带来的偏执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对异质的犹太人和文化表现了强烈的排斥而不是宽容。

## 二、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特点

1. 反复性和周期性。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不仅出现很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并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欧洲的反犹主义从上古时期产生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往往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反犹浪潮,这种周期性在不同的时期受着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它主要与宗教和统治者的宽容程度有关,这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反犹程度在总体上远高于其他时期的一个原因所在,而在当权者相对宽容的南欧和西南欧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略好一些。到了近代,社会经济状况、政权的民主程度和民族主义势头也成为影响反犹太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犹太人就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更是如此。从总体上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较早的西欧反犹太主义要比东欧和俄国稍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民主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法国在1894年还爆发了像“德雷福斯案件”<sup>[5]</sup>这样的恶性反犹事件。

2. 残酷性。历史上欧洲各国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吉普赛人的歧视也同样存在,但都比不上对犹太人迫害的残酷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见和歧视,而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仇视和憎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歧视,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仇视和憎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而是一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即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行为,这些行为还往往受着法律的保护或当局的默许。在整个欧洲,犹太人几乎无一例外的被限制在“格都<sup>[6]</sup>”或是“栅栏区”之内,尽管如此,他们还经常被驱逐<sup>[7]</sup>。生活中的犹太人不仅会经常受到反犹势力殴打、掠夺和袭击,还要面对时不时爆发的反犹大屠杀,先是基督教会“对马兰内”<sup>[8]</sup>和不愿改宗者的屠戮、十字军东征时的滥杀,后来是沙俄和东欧出现的“波格鲁姆”<sup>[9]</sup>事件和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sup>[10]</sup>,在历史上对一个无辜的族裔进行如此残忍的长期迫害恐怕为欧洲所仅见。

3. 广泛性。这种广泛性首先表现在反犹太主义存在的地域上,从南欧到北欧,从西欧到东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生活状况曾经稍好的伊比利亚半岛、中欧的德国和东欧的波兰等后来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其次是社会阶层的广泛性,欧洲社会,从政治、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从宗教人士到非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教派之间不管内部有无分歧,在反犹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利奥·平斯克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对

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是社会各阶层都厌恶的竞争对手<sup>[11]</sup>”。

4. 宗教性。纵观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许多反犹活动以宗教因素为借口，历次反犹活动中与宗教有关的教堂和墓地也会成为袭击的目标。犹太人进入欧洲不久，基督教就上升为国教。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基督教就开始凭借优势地位甚至使用暴力强制人们的皈依，犹太人自然也是被迫改宗的对象。犹太人往往要被迫在改宗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1096年5月，一群犹太人在听到十字军将要到来的消息后，来到了艾德伯特主教那里避难，由于拒绝改宗的要求，反而被主教下令处死，两天之中竟有800人被杀害。基督教会除了利用改宗来迫害犹太人外，还往往炮制或散播一些谣言来迫害犹太人。例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等，“这些故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各地重复着，并几乎总是伴随着‘奇迹’般的悲剧<sup>[12]</sup>”。在历次的反犹恶浪中，与犹太教育有关的东西都会是被袭击的重要对象。1938年的“玻璃破碎之夜”<sup>[13]</sup>事件中，一夜之间就有200座犹太会堂遭焚烧。1937年，罗马尼亚颁布的法令中，还包含有禁止犹太礼仪屠宰、强迫犹太人在安息日劳作等条款。

5. 民族性和种族性。近代以来，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拿破仑帝国的扩张和征服促成了不少欧洲国民意识的觉醒，作为客居地民族的犹太人因为一直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常常被认为是没有效忠于客居地国家，所以自然也是被排挤的对象之一。“在18世纪民族主义开始上升并开始取代日益衰落

的宗教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是被敌视的对象。<sup>[14]</sup>”种族性是反犹太主义的又一特点。十九世纪欧洲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煞有其事的以所谓“科学”的形式来阐述犹太人劣于其它民族。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在《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就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民族，它的任务是破坏日耳曼种族的纯洁；“繁殖一群假希伯来人混血儿，即一个在体质、精神和道德上无疑都发生了蜕化的民族”。正是这种思想最后竟成为希特勒反犹思想的一个理论来源，希特勒明确宣称它的使命就是破坏“犹太人专制的上帝”<sup>[15]</sup>，尽力限制犹太人以维护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在这种荒谬理论的支配下，犹太人竟成了二十世纪那场大浩动的无辜的牺牲品。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在相对成熟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犹太革命家和工运领袖，一些反犹分子利用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心理把反犹与反共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反犹太主义又有了浓厚的反共色彩。1905年发表的《锡安贤达议事录》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可是到了1919年以后，就开始在西欧流行。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一些人开始相信“如果世界要防止心怀敌意的犹太人，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实现，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sup>[16]</sup>尽管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然而还是有众多无辜的犹太人成为冤魂。

反犹太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彻底消除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使之丧失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特性。然而无论是宗教反犹太主义，经济反犹太主义还是种族反犹太主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却促成了犹太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民族特性的增强，并最终促成了近代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当代以色列国的建立，这是那些反犹太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一些学者在研究纳粹大屠杀时

指出“想要‘消灭’犹太民族的希特勒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的重建和犹太文明的复兴进程<sup>[17]</sup>”。

### 三、欧洲反犹太主义的近期回潮

二战以后，伴随着法西斯政权的溃败，反犹太主义曾一度有所收敛。近两年来，由于以色列在新的巴以冲突中一直使用暴力进行残酷的镇压，一股由反以引发的反犹太主义暗潮又开始悄然涌动了。自2001年3月份以来，欧洲各国特别是西欧国家频频发生针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暴力事件，从英国到希腊，从西班牙到丹麦，不断有犹太会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学校遭到袭击，在德国的一些城市，犹太学生上学和放学都不得不由警察护送，德国警方甚至还警告人们不要佩戴犹太人的标识。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一份报告估计，仅在2002年4月欧洲就发生了300多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sup>[18]</sup>。这股反犹太回潮势头之猛，规模之大在二战以来的欧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股反犹太主义回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反犹太主义偏见和传统。二战以后，面对纳粹势力令人发指的罪行，世界人民对犹太人表示了普遍的同情，欧洲各国也对残余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了清算，使反犹太主义的势力大为削弱。但源于宗教和历史文化偏见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并不能一下子消除。早在1963年，在苏联基辅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过一幅插图：一个贪婪的大鼻子犹太人，把瘦骨嶙峋的大手伸向一个盘子，紧紧抓住盘子里的纸币和硬币，反犹寓意自不待言。1968年，在波兰官方支持的反犹运动中，有25000犹太人（占当时波兰犹太人大多数）被迫离开，使这个在1939年尚有300多万犹太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没有犹太人的

反犹太主义国家”<sup>[19]</sup>。1980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所犹太会堂遭受恐怖袭击发生爆炸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有2人为非犹太人。当时的法国总理雷蒙德·巴里竟然在电视中讲话说“他们的目标是犹太人，可伤害的却是无辜的法国人。”<sup>[20]</sup>似乎犹太人并不是法国公民一样，足见对犹太人的偏见之深。德国《明镜》周刊曾在1996年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20%的人不希望他们的邻居是犹太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希望犹太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而另外一些调查表明“反犹思想在老年人和前东德居民中是很普遍的”<sup>[21]</sup>。这些反犹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它仍会破土而出的。

其次是巴以冲突因素。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出于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而且，目前在欧洲各国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仅法国境内就有数以百万计的阿裔公民，这些人几乎都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这次反犹太的主要社会基础所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后，以色列一直采用暴力镇压的做法使欧洲国家极为不满。再加上9.11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极力鼓动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的这一立场更是导致了一些与美国立场相悖的欧洲国家的不快。美国反诽谤联盟去年五六月份的电话调查显示，有62%的人认为最近的反犹太暴力是由反以情绪所导致的<sup>[22]</sup>。

最后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极右翼势力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冷战结束后，原来两极格局下掩盖着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再加上近些年来，欧洲不少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弊病日益暴露，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状况恶化。而传统政党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也不能消除公众对全球化，欧盟扩张和社会安全的忧虑。极右翼势力正是借着人

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迅速坐大的。先是有奥地利海德尔的“自由党”、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后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光头党”及法国的“国民阵线”。这些极右翼势力又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倾向，明确的排斥和反对外来移民。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随着政权的更迭，原来对一些极端种族主义言论的限制被取消，这使得那些极端分子可以肆无忌惮的大放厥词。在波兰，最大的反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LPR)拥有460个议会席位中的37席，不仅如此，他们在议会外还有一定的影响，并得到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传媒的支持和资助<sup>[23]</sup>。这些右翼团体不管在其他方面分歧如何，在反犹太人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反犹主义事件的发生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93年全国发生了656件，其中暴力事件为75件，94年则达到1366件，95年为958件。这些反犹事件的发生与极右翼势力的膨胀是紧密相连的<sup>[24]</sup>。

这股反犹主义势头一方面来势凶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反犹太人与反以色列紧密结合，在反对以色列的名义下进行反犹活动，这使得一些反犹活动表现得更为隐蔽；其次是反犹手段的多样性，反犹分子除了借助传统的反犹手段外，还借助互联网、电视等现代化手段乾地反犹宣传。面对欧洲各国出现的这股反犹主义潮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在谴责的同时还敦促欧洲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反犹活动。这股反犹潮流无论是对欧洲的犹太人还是对近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首先是对以色列和欧洲关系的影响。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后，西欧不少国家的媒体和舆论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从

英国的《独立报》，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到德国的《明镜》周刊都大量刊发批评以色列的文章。去年4月份，法国巴黎的反以示威人数达到4-5万人，起义者打着“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口号，声讨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称沙龙为“刽子手”。欧盟议会在去年6月还通过决议，中止1995年同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和联系协定，并决定采取措施，中止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一个犹太国家，自然对这些反对反犹活动极为敏感和关注。除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反击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犹太人。2002年1月，以色列外交部组织成立了反击反犹主义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ombatting Anti-Semitism)和制止反犹主义协作论坛(Coordination Forum for Countering anti-Semitism)。前者是以色列政府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它下设教育、信息等分委会，并邀请一些国际上知名的非犹太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意在联合世界各地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力量反对反犹主义势力。后者是以色列的官方论坛，由以色列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等组成，致力于收集各种有关反犹主义信息，定期出版有关的报告并制定相应的对策<sup>[25]</sup>。

2002年4月22日，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胜出后，以色列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埃利·伊沙就与法国犹太组织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甚至敦促在法国的犹太人离开法国，移民以色列。以色列颇负盛名的《耶路撒冷邮报》撰文指出“这是二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反犹主义<sup>[26]</sup>”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4月份就含沙射影地说“反犹主义又在欧洲死灰复燃”。欧洲不少国家也承认存在着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但认为这多为极端分子和阿拉伯人所为。欧洲人主要反对

的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人，二者不能相混淆。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去年5月份就警告沙龙不要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反犹的国家，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争吵无疑又给双方关系的发展抹上了一层阴影。

其次是对欧美关系的影响。“9.11”事件以后欧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主张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行动列为恐怖主义，欧洲则认为这样会导致整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对立，对于严重依赖阿拉伯世界石油的欧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出现新的反犹主义势头以后，美国报刊不断地批评欧洲国家对反犹行为制止不力《纽约时报》刊文称“法国政府的做法更加恶化了法国知识界那种与对以色列的激烈批评相关联的反犹主义形势<sup>[27]</sup>”。去年4月底，小布什总统在硅谷发表演说时，点名批评了法国的反犹主义现象。7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西欧出现的反犹暴力活动，敦促西欧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的利益和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参议院还联名上书布什总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促使欧洲国家政府制止日益加剧的反犹暴力活动。

欧洲国家不同意美国的指责，他们认为，欧洲各国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严惩肇事者。英、法、德、比利时和西班牙内政部长举行过会议，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也举行过会议讨论并决定各国之间加强情报交流，协调行动，共同对付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法国、德国等都采取了措施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全保护，惩处极端分子、取缔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网站和社会组织等。欧洲各国还认为，美国所谓的“反犹主义恶魔重新出笼”的说法，是对欧洲国家的污蔑，在欧洲，反犹只是少数人的偏见，不能把对以色列政府的正义批评动不动就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

表示美国的指责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对欧洲的指责无形中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是不利于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这次反犹主义的回潮是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膨胀和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出现的，反犹主义的盛行势必会反过来助长极右翼势力，进而影响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一些反犹分子在攻击犹太人的同时，也在试图为纳粹的罪行反案。去年四月底，伦敦芬斯伯利公园犹太会堂遭破坏时，破坏者就明目张胆的把纳粹的标记划在拉比的诵经台上。在德国，有人甚至把“大屠杀未曾有过”的条幅挂在了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前。目前，世界上有将近1400万犹太人，其中230万人生活在欧洲，其中法国60万，英国28万，德国约10万，乌克兰约18万，俄罗斯约30万<sup>[28]</sup>。这些犹太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融入所在国的政治及经济生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反犹活动不仅会给当地的犹太人带来冲击，也会给这些国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看来，这股反犹议势头已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停止。这次反犹回潮促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并警惕欧洲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警醒以色列政府和犹太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安全必须建立在中东和平的基础之上，正如以色列著名政治家西蒙·佩雷斯在《新创世纪》一书中所说的“和平必须成为以色列人挂在自家门楣上的最璀璨的灯火”<sup>[29]</sup>。如果一味地无视巴勒斯坦人的要求，不仅会引起他们持续的绝望的反抗，还将招致国际社会新的谴责并诱发新一轮的反犹浪潮。

注释：

[1]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Inc. 1985, p.22.

[2] Israel Abrahams, *Jewish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58, p.410-411.

[3]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6 页。

[4] 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5 页。

[5] 1984 年，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06 年德雷福斯被平反并恢复军职。

[6] 英文“ghetto”音译，指遍布欧洲的犹太人隔离区，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在俄国和东欧多为“栅栏区”。

[7] Israel Abrahams, *Jewish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58, p.62-63.

[8] 即“Marrano”，西班牙语意为“猪”，后专指改宗基督教但又暗中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9] 俄语中意为“大屠杀”，指发生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反犹暴力大屠杀。

[10] 英文“Final Solution”，二战中纳粹政权推行的灭绝犹太人的方案。

[11]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1972, p.72.

[12] Malcolm Hay, *The Roots of Christian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81, p.144.

[13] 即“Kristallnacht”，也有译为“水晶之夜”，1938 年 11 月 9 日，因一犹太青年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外交官，纳粹暴徒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是夜有无数犹太人的商店和教堂被砸碎，故得名。

[14]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Inc. 1985, P.30.

[15]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Inc. 1985, P.30.

[16] 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273 页。

[17]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96 页。

[18] 详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网站：<http://www.wjc.org.il>

[19] Abraham Brumberg, “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78.

[20] 徐新：《反犹太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7 页。

[21]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32.

[22] 见美国反诽谤联盟网站：<http://www.adl.org>

[23] Abraham Brumberg, “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82.

[24]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74.

[25] 详见以色列制止反犹太主义论坛网站：<http://antisemitism.org.il>

[26] *Jerusalem Post*, Apr 25, 2002.

[27]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03.

[28] 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网站：<http://www.wjc.org.il>

[29] 西蒙·佩雷斯著，高秋福、戴惠坤译：《新创世纪》，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7 页。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生，上海，200020）

收稿日期：2003 年 6 月